

双向 FDI 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刘海云 龚梦琪

摘要：本文选取 21 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与 10 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进行对比分析，实证研究了双向 FDI 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研究表明：陷入组外商直接投资（IFDI）会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对外直接投资（OFDI）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跨越组主要依赖 OFDI 拉动经济增长，IFDI 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跨越组和陷入组双向 FDI 的交互项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 IFDI 和 OFDI 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促进作用。因此，经济体应着力促进双向 FDI 协调发展，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最终促进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双向 FDI；中等收入陷阱

[中图分类号] F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70 (2019) 07-0142-14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主要形成了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技术创新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驱动因素。Eichengreen 等 (2011)^[1]的研究证实了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原因 85%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下滑，另外 15%则是由于资本积累不足；孔泾源 (2011)^[2]认为当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渡时，由于存在一定的“后发优势”，技术引进和模仿在一定程度上比技术创新更重要，但当该经济体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时，技术创新就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关键；陈亮 (2011)^[3]认为中国以往建立在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以及土地等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衰退，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经济体应该以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蔡昉 (2011)^[4]认为高收入和低收入经济体能在全局化中获益的原因在于其分别在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位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处于一种“比较优势真空”的状态，因此要实现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过渡就需要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高速增长，以其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张德荣 (2013)^[5]基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双向 FDI (对外直接投资) 的环境效应研究”(2017WKZDJC008)。

[作者信息] 刘海云：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龚梦琪（通讯作者）：武汉工程大学商学院年薪制副教授 430205 电子信箱 gongmq1992@163.com。

于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研究表明,原创性的技术进步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二,制度因素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个经济体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以及技术的提升需要高质量的制度做保障。这就促使学术界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探讨良好的制度体系是否有助于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Beck 和 Laeven (2006)^[6]认为一个经济体经济阶段的攀升与其政治制度的调整密切相关;Naughton (2006)^[7]认为对于后发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更需要良好的制度为支撑;世界银行在 2008 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也肯定了制度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影响,同时指出日本、韩国等经济体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正是制度;Gill 和 Kharas (2009)^[8]认为那些成功迈向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正是由于其在促进国内一体化的过程中有效地调整了相关制度;高杰 (2012)^[9]的研究则认为中国所具备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良制度将促进其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外商直接投资 (IFDI) 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会对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产生影响。Caldentey (2012)^[10]分析了智利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认为 IFDI 的技术溢出和知识转移效应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到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由于其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消耗过快,研究与开发 (R&D) 支出水平较低以及私营部门缺乏创新引致了智利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停滞;张德荣 (2013) 认为 IFDI 对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仅表现在对资本积累的推动上,同时也作用于对该经济体的技术推动和管理创新上;周云波 (2015)^[11]的研究认为 IFDI 的技术转移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有助于缩小国内企业工资差距,从而促进中国尽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Vivarelli (2016)^[12]则认为 IFDI 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技术进步和结构变革,进而有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学者分别从国际竞争力、人口红利、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等视角出发研究了其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蔡昉, 2010^[13], 2011; Felipe et al., 2012^[14])。

分析“中等收入陷阱”影响因素的视角较多,而基于投资角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IFDI 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上,相对忽视了 OFDI 的影响效应,将二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研究其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没有引起关注。事实上,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已经证实了一个经济体经济发展与国际投资规模之间的关系,随着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OFDI 将不断上升,当该经济体发展到 IDP (投资发展路径理论) 范式的第四阶段时,OFDI 将会超过 IFDI。因此,深度把握双向 FDI 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补充和拓展:一是将 IFDI 和 OFDI 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双向 FDI 的角度实证分析其对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对比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组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组双向 FDI 的影响机制;三是为了系统测度 IFDI 和 OFDI 之间的替代或互补作用,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同时纳入 IFDI 和 OFDI 的交互项。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事实

世界银行将各个国家和地区按人均国民收入划分为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4个区间，其具体划分标准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收入阶段的分类标准

收入类型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低收入	<=610	<=765	<=755	<=875	<=1005	<=1025
中低收入	611~2465	766~3035	756~2995	876~3465	1006~3975	1026~4035
中高收入	2466~7620	3036~9385	2996~9265	3466~10725	3976~12275	4036~12475
高收入	>7620	>9385	>9265	>10725	>12275	>1247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

注：单位以当年价格美元（按照汇率法）衡量。

按照这样一个动态的划分标准，Felipe等（2012）认为可以通过设定时间门槛来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即如果一个经济体在跨入中等收入的行列之后，未在规定的年限内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则认为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张德荣（2013）同样沿用了这一方法，他认为如果中高收入经济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例如30年）都未跨入高收入的行列，则认为其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迄今为止，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经济体是“亚洲四小龙”和日本，而那些曾与欧洲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拉丁美洲国家却一直未能成功跻身高收入的行列。本文参照Aiyar S（2013）^[15]提出的方法，以2005年为基期对各经济体的人均GDP通过购买力平价转换为国际美元^①，并选取3000国际美元作为阈值点，分析1950年以来各经济体在达到这一门槛值后的经济增长轨迹，从而判断“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

如图1^②所示，横坐标表示时间长度 t ，纵坐标则表示通过购买力平价换算后的人均GDP，其中 $t=0$ 表示经济体人均GDP首次达到3000国际美元这个临界点的年份。可以看出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经济增长轨迹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以及亚洲的马来西亚虽然很早就已经跨入了中等收入的行列，但其经济增长趋势十分平缓，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的现象，以至于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都未能成功跨入高收入的行列，因此认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现象确实存在。

^①国际美元由购买力平价学说（简称PPP）和国际商品均价理论发展而来，体现一种货币的单位在国内价值是多少，把国际美元作为计价单位可以在不同经济体和时期之间作较为准确的比较。

^②本文在图1中剔除了日本和新加坡的数据，原因是这两个国家在1950年之前其人均GDP就已经超过3000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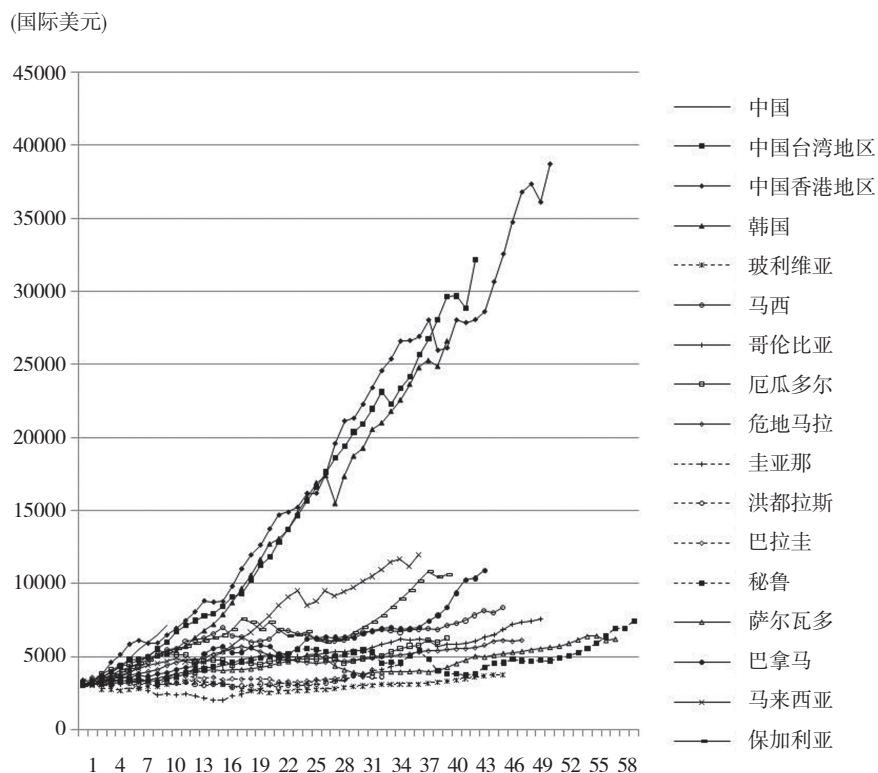


图 1 各经济体的人均 GDP

当然，现阶段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度量存在一些争议，部分学者认为由于技术进步的存在，经济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会不断扩大，因此采用绝对指标来衡量一个经济体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Woo (2011)^[16]认为可以用追赶指数（CUI）这一相对指标来衡量一个经济体是否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即采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估算一个经济体的人均 GDP 所占美国人均 GDP 的比重，若 CUI 的值小于 20% 则被认为是低收入经济体，若该值位于 20%~55% 之间则被定义为中等收入经济体，若该值大于 55% 就认为该经济体真正跨入了高收入的行列。

如图 2^① 所示，本文选取 20% 作为 CUI 的阈值点，以判断自 1950 年以来经济体在首次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的经济增长趋势。其中，横坐标表示时间长度 t ，纵坐标表示追赶指数的值，与图 1 通过人均 GDP 来衡量一个经济体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所不同，从追赶指数来看，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追赶指数呈下降趋势，甚至跌破 20% 的临界点。不过，从经济增长的轨迹来看，图 1 和图 2 呈现明显的同步性，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日本的追赶指数曲线呈明显的

① 本文在图 2 中剔除了新加坡及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其原因是新加坡在 1950 年之前其追赶指数就已经超过了 20%，而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或地区的追赶指数一直低于 20%。

上升趋势，且都以较快的速度超越了55%这一临界值，跨入了高收入的行列，而拉丁美洲国家尽管早就已经迈入中等收入的行列，但其经济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明显下滑的现象，引致其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因此，从追赶指数这一指标来看，“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现象依旧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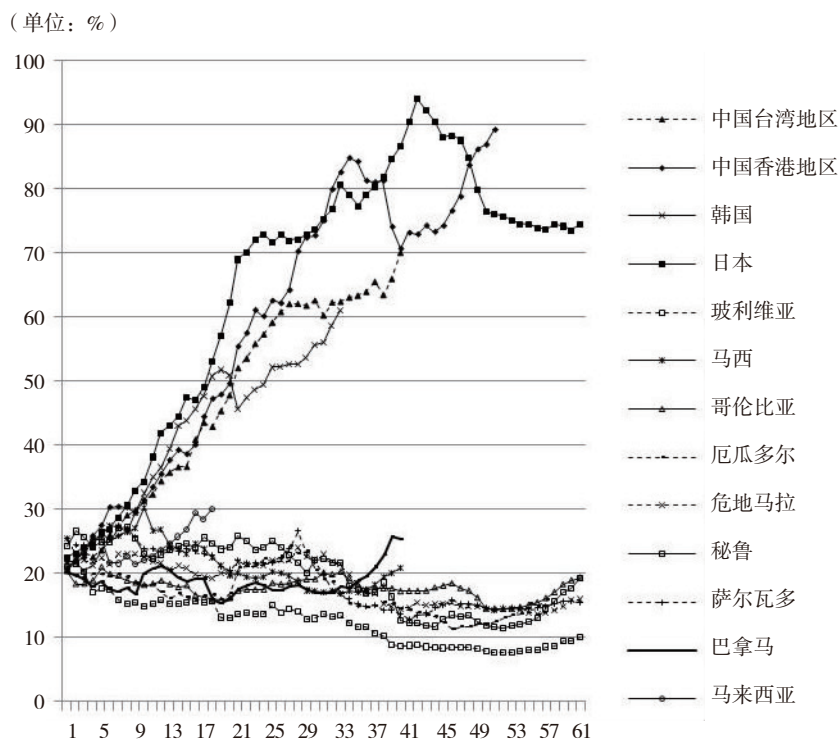


图2 各经济体的追赶指数

资料来源: <https://fred.stlouisfed.org/categories/33100>。

三、双向 FDI 影响“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机制

由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增长问题，因此要准确理解双向 FDI 影响“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机制，可以从经济增长的视角进行分析。一般情况下，IFDI 和 OFDI 对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和方向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些经济体更依赖于 IFDI 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另一些经济体则可能更依赖于 OFDI 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如果能有效测度不同发展阶段 IFDI、OFDI 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有利于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协调发展 IFDI 和 OFDI，进而促进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顺利跨越这一阶段。

(一) IFDI 和 OFDI 影响“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机制

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IFDI 和 OFDI 会对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带来显著影响。Romer (1986)^[17] 和 Lucas (1988)^[18] 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最早论证了 IFDI 的经

济增长效应, De Mello (1999)^[19]、Bengoa (2003)^[20]、马岩 (2006)^[21]的研究也表明 IFDI 的引入将显著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Herzer (2010)^[22]和 Li 等 (2016)^[23]的研究则表明 OFDI 会显著增强母国经济实力。因此, 一个经济体要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 通过 IFDI 和 OFDI 所实现的经济增长效应将是重要的驱动因素, 合理把握两者之间的互动协调机制将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对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而言, 尽管其已经意识到 IFDI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但对 IFDI 的过度依赖反而造成了国内经济结构畸形。同时这些经济体大多忽略了 OFDI 的影响效应, 这就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从而引致该经济体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反观那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 在注重引入 IFDI 的同时, 也十分注重 OFDI 的发展。事实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 仅仅依靠引入 IFDI 参与全球分工, 被动地接受国外企业在全局的战略布局, 确实会抑制经济增长。一般而言,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技术水平相对落后, 这些经济体要想通过提升技术水平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就必须依赖于对发达经济体技术的模仿, 但从这些经济体的 IFDI 和 OFDI 规模来看, OFDI 份额较小, 且投资发展路径呈现明显的波动性, 从样本数据也可以看出, 部分经济体近几年几乎未发展 OFDI, 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致研发成果反馈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外围研发剥离效应不足, 从而不利于在全球配置资源, 进而弱化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 对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而言, 应及时意识到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意义。

基于以上事实, 本文提出理论假说 1: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 IFDI 可能会促进经济的增长, 但由于忽视了 OFDI 的作用机制, 会引致 OFDI 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这也是经济体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的原因之一。

(二) IFDI 和 OFDI 影响“中等收入陷阱”的互补或替代关系

一方面, IFDI 是 OFDI 的基础, OFDI 是 IFDI 的有力支持 (尹应凯, 2002)^[24]。具体而言, 如果 IFDI 的引入会增强企业竞争力, 就有利于进行更多的 OFDI, 而 OFDI 在资金投向上具有更大的主动权, 因此, 母国可以通过进行技术寻求性的 OFDI, 获取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 进而通过技术反馈机制促进母国生产技术的提高, 这就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而母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又有利于吸引更多的 IFDI, 从而形成了 IFDI 与 OFDI 之间的良性循环发展, 最终实现 IFDI 和 OFDI 促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互补关系。另一方面, 如果 IFDI 的引入并未有效促进企业竞争力的增强, 这就可能进一步抑制 OFDI, 最终不利于该经济体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此为 IFDI 和 OFDI 抑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替代关系。

对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而言, IFDI 的引入确实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竞争力的上升, 此时, 如果经济体积极开展 OFDI 会形成 IFDI 和 OFDI 之间的良性循环, 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此, 本文提出理论假说 2: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引入 IFDI 确实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竞争力的增长, 此时, 如果同时存在 OFDI, 则会形成 IFDI 和 OFDI 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互补作用。

四、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一) 模型设定

参考 Woo (2011)、张德荣 (2013)、代法涛 (2014)^[25] 等人的研究, 本文分别选用人均 GDP 和追赶指数 (CUI) 作为被解释变量。为了消除变量的量纲, 对数据做对数化处理, 设定回归模型如下:

$$\ln PGDP_{it} = \alpha_0 + \alpha_1 \ln IFDI_{it} + \alpha_2 \ln OFDI_{it} + \alpha_3 \ln IFDI_{it} \times \ln OFDI_{it} + \alpha_4 X_{it} + \mu_i + v_{it} \quad (1)$$

$$\ln CUI_{it} = \beta_0 + \beta_1 \ln IFDI_{it} + \beta_2 \ln OFDI_{it} + \beta_3 \ln IFDI_{it} \times \ln OFDI_{it} + \beta_4 X_{it} + \mu_i + v_{it} \quad (2)$$

其中, $\ln PGDP_{it}$ 表示第 t 年 i 经济体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ln CUI_{it}$ 表示第 t 年 i 经济体的追赶指数, $\ln IFDI_{it}$ 表示第 t 年 i 经济体的人均 IFDI 存量, $\ln OFDI_{it}$ 表示第 t 年 i 经济体的人均 OFDI 存量, X_{it} 为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变量, 如城市化水平、制度质量、产业结构、贸易开放程度、固定资本投资率、技术进步等变量, μ_i 表示地区效应, v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为了系统考虑双向 FDI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在模型中引入了 $\ln IFDI_{it}$ 和 $\ln OFDI_{it}$ 的交互项。所选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世界银行 (WDI) 和 ICRG 数据库。

(二) 数据说明

由于部分经济体某些变量的数据存在缺失, 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及可信性, 对数据缺失值较多的经济体进行剔除, 对于存在少量缺失值的经济体利用均值插值法对数据进行补充, 最终选取 21 个^①典型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 以及 10 个^②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进行对比分析, 时间跨度为 2000—2013 年^③。

在变量的选取上, 本文采用这些经济体的人均 GDP 和追赶指数 (CUI) 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 人均 IFDI 和人均 OFDI 存量数据作为双边投资规模的代理变量, 并使用 GDP 平减指数以 2000 年为基期对该数据进行平减, 单位均为美元。同时以一个经济体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城市化水平 (UR), 以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 (INS), 以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 的比重衡量贸易开放程度 (TR), 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 GDP 的比重衡量固定资本形成率

①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分别为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圭亚那、洪都拉斯、牙买加、墨西哥、巴拉圭、秘鲁、萨尔瓦多、巴拿马, 东欧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俄罗斯, 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非洲的南非、阿尔及利亚。

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分别是亚洲的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日本、以色列, 欧洲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

③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 本文仅选取 2000—2013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虽然未能反映双向 FDI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但从数据的状态来看, 基本可以反映出跨越组和陷入组在引入 IFDI 和 OFDI 之间的差异, 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双向 FDI 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因此, 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

(*INVEST*), 以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衡量原创性技术进步 (*TECH*)^①, 以经济体腐败指数 (*COR*)^② 衡量制度质量。

五、基于国别比较的实证分析

(一) 实证检验结果

本文以面板随机效应模型为基础进行回归分析, 表2和表3的第(1)列和第(4)列分别报告了陷入组和跨越组的估计结果。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 为了降低估计的偏误, 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IV)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表2和

表2 以人均GDP为被解释变量的面板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陷入组			跨越组		
	RE (1)	IV-2SLS (2)	IV-2SLS (3)	RE (4)	IV-2SLS (5)	IV-2SLS (6)
<i>lnFDI</i>	0.236*** (0.038)	0.155** (0.077)	0.156** (0.076)	-0.224** (0.103)	-0.399*** (0.116)	-0.273*** (0.105)
<i>lnOFDI</i>	-0.128** (0.058)	-0.267** (0.131)	-0.268** (0.130)	0.246*** (0.093)	0.165* (0.092)	0.150* (0.088)
<i>lnFDI</i> × <i>lnOFDI</i>	0.020** (0.008)	0.050*** (0.018)	0.050*** (0.018)	0.018* (0.010)	0.031*** (0.010)	0.025*** (0.010)
<i>lnUR</i>	-0.321 (0.217)	0.419*** (0.091)	0.401*** (0.097)	0.504*** (0.132)	0.492*** (0.096)	0.515*** (0.109)
<i>lnCOR</i>	0.103*** (0.039)	0.076 (0.062)	0.072 (0.063)	-0.257*** (0.087)	-0.068 (0.099)	-0.297*** (0.089)
<i>lnINS</i>	0.574*** (0.092)	0.309*** (0.096)	0.301*** (0.095)	0.053 (0.057)	0.054 (0.044)	0.077* (0.043)
<i>lnINVEST</i>	0.225*** (0.063)	0.132 (0.106)	0.122 (0.108)	0.387*** (0.120)	0.473*** (0.119)	0.280** (0.117)
<i>lnTR</i>	-0.086* (0.045)	-0.110** (0.044)	-0.112** (0.045)	-0.419*** (0.042)	-0.434*** (0.036)	-0.335*** (0.037)
<i>lnTECH</i>	0.094*** (0.018)	0.012 (0.010)	0.041 (0.038)	-0.019 (0.033)	-0.057 (0.038)	-2.283*** (0.342)
(<i>lnTECH</i>) ²			-0.002 (0.003)			0.115*** (0.017)
_CONST	4.545*** (0.952)	3.592*** (0.787)	3.647*** (0.793)	7.082*** (1.086)	8.329*** (1.156)	18.804*** (2.047)
R ²	0.667	0.830	0.830	0.789	0.811	0.854
识别不足检验		62.253***	62.074***		34.853***	35.130***
弱识别检验		54.064	54.195		142.989	128.849
Hansen P 值		0.485	0.483		0.261	0.742

注: *、**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回归系数括号内对应的是估计值的标准误。

①由于世界银行未报告中国台湾地区的数据, 且中国香港地区2000—2013年科技论文数量数据缺失, 因此本文对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科技论文数量的数据采用手动检索的方式进行搜集。数据采集方法是依据世界银行对科技论文数量的测度方法, 从美国ISI数据库中分别检索2000—2013年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 and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的Article数量作为该地区的科技论文发表数量指标。

②腐败指数所定义的范围为0~6, 其中0表示最腐败的状态, 6则表示最清廉的状态。

表3的第(2)列和第(5)列分表报告了陷入组和跨越的IV-2SLS估计结果。同时,由于模型中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在回归模型中引入 $\ln TECH$ 的平方项作为解释变量(张德荣,2013),回归结果如表2和表3的第(3)列和第(6)列所示。对于工具变量法来说,估计的一致性依赖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文选取 $IFDI$ 、 $OFDI$ 以及两者交互项的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并报告了Hansen的P值、工具变量的识别不足检验和弱识别检验结果,发现分别以人均GDP和CUI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大小以及符号方向基本保持一致,说明结果呈现较好的稳健性。

表3 以CUI为被解释变量的面板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陷入组			跨越组		
	RE (1)	IV-2SLS (2)	IV-2SLS (3)	RE (4)	IV-2SLS (5)	IV-2SLS (6)
$\ln IFDI$	0.136*** (0.045)	0.150* (0.078)	0.151** (0.077)	-0.393*** (0.107)	-0.629*** (0.129)	-0.552*** (0.117)
$\ln OFDI$	-0.134* (0.069)	-0.215 (0.139)	-0.216 (0.137)	0.162* (0.097)	0.014 (0.100)	-0.053 (0.087)
$\ln IFDI \times \ln OFDI$	0.022** (0.010)	0.044** (0.019)	0.044** (0.019)	0.030*** (0.011)	0.048*** (0.011)	0.046*** (0.010)
$\ln UR$	0.535** (0.244)	0.414*** (0.104)	0.390*** (0.108)	0.723*** (0.137)	0.664*** (0.098)	0.722*** (0.098)
$\ln COR$	0.204*** (0.046)	0.120* (0.063)	0.115* (0.063)	-0.178** (0.091)	0.163 (0.110)	-0.061 (0.096)
$\ln INS$	0.735*** (0.109)	0.296*** (0.108)	0.286*** (0.108)	0.121** (0.060)	0.107** (0.042)	0.144*** (0.039)
$\ln INVEST$	0.174** (0.075)	0.087 (0.101)	0.074 (0.103)	0.557*** (0.125)	0.595*** (0.118)	0.407*** (0.112)
$\ln TR$	-0.226*** (0.052)	-0.100** (0.051)	-0.103** (0.050)	-0.448*** (0.044)	-0.459*** (0.037)	-0.341*** (0.035)
$\ln TECH$	0.003 (0.020)	0.004 (0.011)	0.042 (0.042)	-0.138*** (0.034)	-0.171*** (0.037)	-3.314*** (0.346)
$(\ln TECH)^2$				-0.003 (0.003)		0.160*** (0.017)
_CONST	0.593 (1.081)	-2.388*** (0.011)	-2.316*** (0.805)	1.781 (1.131)	3.844*** (1.264)	19.211*** (2.008)
R ²	0.478	0.809	0.810	0.855	0.786	0.887
识别不足检验		62.253***	62.074***		34.758***	34.180***
弱识别检验		54.064	54.195		170.998	101.336
Hansen P值		0.492	0.487		0.129	0.728

注: *、**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括号内对应的是估计值的标准误。

(1)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是人均 IFDI ($\ln IFDI$)、城市化水平 ($\ln UR$)、制度 ($\ln COR$) 和产业结构 ($\ln INS$)。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是人均 OFDI ($\ln OFDI$)、城市化水平 ($\ln UR$)、固定资本形成率 ($\ln INVEST$)、原创性技术进步 ($\ln TECH$)。

(2)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 IFDI 的上升对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引入原创性技术进步的平方项之后, 这一结果依旧稳健。考虑到 IFDI 的样本均值是 6.496, 标准差是 0.881, 说明 IFDI 对陷入组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实际影响。而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而言, IFDI 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的增长, 这一结论与张德荣 (2013) 的研究结果一致, 他认为 IFDI 将显著促进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而对于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的经济体而言, IFDI 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

(3) OFDI 会显著抑制陷入组的经济增长, 但对跨越组的经济增长会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 陷入组 OFDI 份额较小, 且投资路径呈现明显的波动性,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的增长, 本文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机理,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对 OFDI 变得敏感起来, 因此, OFDI 会显著促进跨越组的经济增长。至此, 假说 1 得证。

(4) 跨越组和陷入组 IFDI 和 OFDI 的交互项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增长, 说明 IFDI 和 OFDI 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补效应, 也就是说 IFDI 和 OFDI 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促进关系。事实上, 随着 IFDI 的引入, 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资本, 这就有利于内资企业竞争力的上升, 而竞争力是 OFDI 的基础。至此, 假说 2 得证。

(5) 其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一,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促进经济的增长; 第二, 制度水平会显著促进陷入组的经济增长, 但对跨越组的经济增长会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 说明随着政府廉洁程度的不断上升, 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会增强, 但对跨越组而言, 制度质量会显著抑制经济增长, 张德荣 (2013) 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 在这一结果的基础上, 他进一步对制度因素进行联合显著性检验, 认为腐败对高收入经济体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 随着政府清廉程度的上升, 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正效应将会逐步提高; 第三, 产业结构和固定资本形成率对经济增长同样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产业结构在跨越组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第四, 提高贸易开放程度会显著抑制经济的增长, 事实上, Papageorgiou (2002)^[26]也得出了相似结论; 第五, 随着经济的增长, 原创性技术进步对陷入组人均 GDP 的边际负效应会逐渐显现, 说明对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而言, 对技术的模仿也许比技术研发更有效率。而对跨越组而言, 原创性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非线性影响, 随着经济的增长, 其驱动作用会逐渐增强, 说明技术进步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

(二) 稳健性检验

前文使用人均 *IFDI* 和人均 *OFDI* 的存量数据作为双边投资的代理变量, 能够反映 *IFDI* 和 *OFDI* 长远战略性投资的性质, 为了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参照张德荣 (2013)、刘瑞明 (2015)^[27] 的方法, 本文使用 (人均外商直接投资/人均 GDP) ×100 和 (人均对外直接投资/人均 GDP) ×100 来衡量双边投资强度。同时使用 IV-GMM 方法对模型重新进行估计, 具体结果如表 4 和表 5 所示, 可以发现系数方向及显著性基本与表 2 和表 3 的结果一致, 因此认为结果比较稳健。

表 4 以人均 GDP 为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陷入组			跨越组		
	RE (1)	IV-GMM (2)	IV-GMM (3)	RE (4)	IV-GMM (5)	IV-GMM (6)
ln <i>IFDI</i>	0.080** (0.038)	0.188*** (0.067)	0.190*** (0.067)	-0.381*** (0.085)	-0.256*** (0.093)	-0.230*** (0.084)
ln <i>OFDI</i>	-0.158* (0.083)	-0.226** (0.115)	-0.226** (0.114)	0.207** (0.094)	0.218*** (0.078)	0.130* (0.077)
ln <i>IFDI</i> ×ln <i>OFDI</i>	0.046** (0.023)	0.044*** (0.016)	0.044*** (0.016)	0.074*** (0.020)	0.021*** (0.008)	0.024*** (0.008)
ln <i>UR</i>	-0.076 (0.291)	0.439*** (0.087)	0.421*** (0.093)	0.468** (0.192)	0.470*** (0.095)	0.501*** (0.108)
ln <i>COR</i>	0.153*** (0.050)	0.095* (0.056)	0.091 (0.056)	-0.116 (0.126)	-0.201** (0.093)	-0.332*** (0.080)
ln <i>INS</i>	0.509*** (0.122)	0.315*** (0.087)	0.309*** (0.086)	0.151* (0.087)	0.045 (0.047)	0.071 (0.045)
ln <i>INVEST</i>	0.506*** (0.076)	0.143 (0.101)	0.133 (0.103)	0.241 (0.176)	0.388*** (0.118)	0.172 (0.126)
ln <i>TR</i>	-0.117** (0.056)	-0.093** (0.044)	-0.096** (0.044)	-0.397*** (0.069)	-0.413*** (0.033)	-0.322*** (0.034)
ln <i>TECH</i>	0.163*** (0.023)	0.012 (0.008)	0.038 (0.035)	-0.048 (0.046)	-0.013 (0.031)	-2.063*** (0.300)
(ln <i>TECH</i>) ²			-0.002 (0.002)			0.106*** (0.015)
_CONST	3.874*** (1.211)	3.172*** (0.740)	3.219*** (0.744)	8.691*** (0.917)	7.402*** (0.955)	17.803*** (1.797)
R ²	0.358	0.829	0.829	0.586	0.799	0.842
识别不足检验		73.039***	73.045***		38.615***	38.652***
弱识别检验		91.160	90.857		309.888	295.162
Hansen P 值		0.115	0.111		0.605	0.181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回归系数括号内对应的是估计值的标准误。

表5 以CUI为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陷入组			跨越组		
	(1)	IV-GMM (2)	IV-GMM (3)	RE (4)	IV-GMM (5)	IV-GMM (6)
$\ln IFDI$	0.080** (0.038)	0.188*** (0.067)	0.190*** (0.067)	-0.544*** (0.078)	-0.765*** (0.085)	-0.456*** (0.065)
$\ln OFDI$	-0.158* (0.083)	-0.226** (0.115)	-0.226** (0.114)	0.083 (0.086)	0.002 (0.075)	0.094 (0.061)
$\ln IFDI \times \ln OFDI$	0.046** (0.023)	0.044*** (0.016)	0.044*** (0.016)	0.106*** (0.019)	0.137*** (0.019)	0.087*** (0.014)
$\ln UR$	-0.076 (0.291)	0.439*** (0.087)	0.421*** (0.093)	0.616*** (0.192)	0.616*** (0.133)	0.675*** (0.136)
$\ln COR$	0.153*** (0.050)	0.095* (0.056)	0.091 (0.056)	-0.058 (0.115)	-0.357*** (0.120)	-0.033 (0.112)
$\ln INS$	0.509*** (0.122)	0.315*** (0.087)	0.309*** (0.086)	0.275*** (0.080)	0.267*** (0.071)	0.211*** (0.058)
$\ln INVEST$	0.506*** (0.076)	0.143 (0.101)	0.133 (0.103)	0.334** (0.161)	0.586*** (0.152)	0.349** (0.144)
$\ln TR$	-0.117** (0.056)	-0.093** (0.044)	-0.096** (0.044)	-0.410*** (0.063)	-0.482*** (0.050)	-0.348*** (0.043)
$\ln TECH$	0.163*** (0.023)	0.012 (0.008)	0.038 (0.035)	-0.174*** (0.042)	-0.285*** (0.045)	-3.181*** (0.471)
$(\ln TECH)^2$			-0.002 (0.002)			0.153*** (0.024)
_CONST	3.874*** (1.211)	3.172*** (0.740)	3.219*** (0.744)	3.019*** (0.839)	3.767*** (0.865)	17.152*** (2.285)
R ²	0.358	0.829	0.829	0.777	0.737	0.772
识别不足检验		73.039***	73.045***		21.702***	30.964***
弱识别检验		91.160	90.857		49.068	123.475
Hansen P 值		0.115	0.111		0.799	0.556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括号内对应的是估计值的标准误。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国别比较的方法对10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和21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进行了比较。以期提出合理的资本流动政策促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顺利实现跨越。研究结果显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与IFDI和OFDI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但对不同组别经济体的经济而言，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有所不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OFDI；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则主要依赖于IFDI。从双向FDI的交互项系数来看，陷入组和跨越组的双向FDI之间呈现明显的互补效应，也就是说双向FDI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促进作用。为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IFDI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仍旧不能忽视，对于中等收入经济体而言，引进外资依旧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陷入组应在大力引入IFDI的同时，注重引资的质量，更多引入一些技术型IFDI，改变以往“重引进、轻吸

收”的技术引进格局,积极吸收其所搭载的管理创新能力和高素质人才,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适时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加大 OFDI 力度,鼓励企业“走出去”。虽然现阶段 OFDI 会抑制陷入组的经济增长,但相对于 IFDI 仅在本国配置资源要素这一发展模式来说,OFDI 会将一个经济体的开放程度显著提高,更好地与世界经济接轨,进而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开拓市场,真正实现投资规模的扩大化。因此,从长期来看,加大 OFDI,适时转换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将有利于经济体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在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在提升 IFDI 质量的同时,应加快以 OFDI 为核心的“走出去”步伐,形成对外开放战略新布局。从双向 FDI 的交互效应系数来看,其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协同发展双向 FDI,在注重引资质量、加大引资数量的同时,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把握 OFDI 对经济的正向驱动作用,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统筹内外发展,将以往的出口导向型对外发展模式向平衡协调发展战略转变,将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避免国际分工的低端锁定,最终促进经济体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参考文献]

- [1] EICHENGREEN B, PARK D, SHIN K. When Fast-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J]. *Asian Economic Papers*, 2012, 11(1):42-87.
- [2] 孔涇源.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J]. *改革*, 2011(10):5-13.
- [3] 陈亮.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开放创新——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1(3):50-61.
- [4] 蔡昉. “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J]. *经济学动态*, 2011(12):4-9.
- [5] 张德荣.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J]. *经济研究*, 2013, 48(9):17-29.
- [6] LAEVEN B L. Institution Building and Growth in Transition Economi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6, 11(2):157-186.
- [7] NAUGHTON B J.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M]. MIT Press, 2006.
- [8] GILL I, KHARAS H. Gravity and Friction in Growing East Asia[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09, 25(2):190-204.
- [9] 高杰, 何平, 张锐.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述评[J]. *经济学动态*, 2012(3):83-89.
- [10] CALDENTEY E P. Income Convergence, Capability Divergence, and the Middle Income Trap: An Analysis of the Case of Chile[J].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2, 47(2):185-207.
- [11] 周云波, 陈岑, 田柳.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15, 50(12):128-142.
- [12] VIVARELLI M. The Middle Income Trap: A Way out Based on Technological and Structural Change[J]. *Economic Change and Restructuring*, 2016, 49(2-3):159-193.
- [13] 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 *经济研究*, 2010, 45(4):4-13.
- [14] FELIPE J, ABDON A, KUMAR U. Track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What Is It, Who Is in It, and Why? [J].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2012(715):1-59.
- [15] AIYAR M S, DUVAL M R A, PUY M D, et al. Growth Slowdowns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3.

- [16] WOO W T. Understan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Malaysia[J]. World Economy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2011: 17-34.
- [17] ROMER P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5): 1002-1037.
- [18] LUCAS JR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1): 3-42.
- [19] DE MELLO L 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Led Growth: Evidence from Time Series and Panel Data[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99, 51(1): 133-151.
- [20] BENGUA M, SANCHEZ-ROBLES B.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conomic Freedom and Growth: New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3, 19(3): 529-545.
- [21] 马岩.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J]. 统计研究, 2006(3): 51-55.
- [22] HERZER D. Outward FDI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2010, 37(5): 476-494.
- [23] LI J, STRANGE R, NING L, et al.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6, 25(5): 1010-1019.
- [24] 尹应凯. 试论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的互动关系[J]. 国际贸易问题, 2002(1): 36-39.
- [25] 代法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理论、经验和对策——基于44个国家的跨国实证分析[J]. 财经研究, 2014, 40(2): 54-66.
- [26] PAPAGEORGIOU C. Trade as a Threshold Variable for Multiple Regimes[J]. Economics Letters, 2002, 77(1): 85-91.
- [27] 刘瑞明, 赵仁杰. 西部大开发: 增长驱动还是政策陷阱——基于PSM-DID方法的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6): 32-43.

(责任编辑 王 瀛)

Two-way FDI and Striding Across the “Middle Income Trap”

LIU Haiyun GONG Mengqi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21 economies that fell into the “middle income trap” and compared them with 10 economies successfully striding across the “middle income trap”, and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 impact of two-way FDI on the “middle income trap”.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erms of the countries falling into the “middle income trap”,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FDI) will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whil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will inhibit the growth to a certain extent; economies that have stridden across the “middle income trap” mainly rely on OFDI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and it will be inhibited by IFDI to some extent; the interaction coefficients of two-way FDI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both in the falling into group and striding across group, indicating that there indeed exists a certain mutual benefits relationship between IFDI and OFDI. Therefore, the economies should focus on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wo-way FDI, forming a new pattern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ultimately striding across the “middle income trap”.

Keywords: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wo-way FDI; Middle Income Trap